

闯海去

1988年11月7日，还在四川南充日报的我，收到一封电报，要我“于本月20日前来海南，边工作边商调，辞职亦可”。一个月后，又来一封电报，催我前往报到。署名为海南特区报——以为是海南日报改名后的省委机关报。

惊喜之后，我陷入难以抉择的境地。

我向往到改革开放的海南大特区工作。年初去海南，曾在海南日报填写应聘表，留下个人资料，但一直杳无音信，便萌生“跳槽”到成都去的念头。这两天，成都一家报社刚刚走完商调程序，同意我调入，还给了两个进城指标。妻子也联系好到省政府某厅工作。在当时，从南充这类中小城市调往大都市的成都，需要进城指标，别说给两个，就是一个也很难。

去海南，还是到成都？我和妻子面临人生的重大选择。最后商定，我暂不去成都报到，再跑海南看看，重点搞清楚海南特区报是不是省委机关报，能不能够办理调动手续后，才决定去向。

我将此事告诉了好朋友羊慧明。这位思想活跃、才华出众的新华社成都分社青年记者建议说，干脆邀约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，去海南办一张“同仁报”。在地方机关党报干了近10年、有些“不安本分”的我，当即赞同。隔了几天，羊慧明告诉我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四川记者站的周平、四川日报的戴善奎，都有浓厚的兴趣，你可先去海南看看，我们随后赶来。

□张松林

一路上，多见闯海人

12月下旬，我第二次踏上远赴海南的路程。同行的有内弟小郝，他是企业行政人员，也想到海南看看。

一路向东南，一路遇拥挤。浩浩荡荡的人群里，多见奔向海南的闯海人。

下午，我和小郝从南充市区乘坐的汽车，来到重庆菜园坝火车站。一下车，立刻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。站内站外，密密麻麻，到处都是人，根本购不到直达广州、湛江的车票。无奈，只得买了晚上10点多去贵阳的站票。

第二天清晨，到了贵阳，好不容易挤进转往湛江的火车，还是站票。车上座无虚席，连过道、厕所都挤满了人，有点像当年学生大串联的场景。虽是冬天，我竟满头大汗，热得发晕，两条腿软软的。情急之中，我们挤进餐车坐下。到了湛江，已是深夜，又赶乘夜班汽车前往徐闻，车上还是坐满了人。

第三天早上，我们来到海安港口候船。举目所见，码头上、海岸边，成群结队的人们，提包拎物，像潮水一样奔涌，说话声、欢笑声、喊叫声充斥于耳，已经压过海浪的轰鸣，心头的热血又沸腾起来。

此时的闯海人群中，不仅有风华正茂的大学生，还有雄心勃勃的商人，踌躇满志的教师、公务员，以及肩扛行李、手提蛇皮口袋的打工者——人员之多，远远超过我年初来海南看到的情景。

不久，载人又载车的滚装船抵达港口。随着黑压压的人群挤上船，我已是气喘吁吁，汗流满面。身旁，形形色色的闯海人，操着南腔北调，兴奋地交谈着，仿佛过了琼州海峡就能实现心中的梦想。

也许是有了渡海的经验，心情又好，我这次没有晕船。到了海口港，还是换乘“三脚猫”，直奔海南日报社。

在报社人事处，知道了真相：海南日报升格为省委机关报，海南特区报是海南日报正在筹办的子报；我有幸被海南特区报老总从一大堆求职资料里选中，故收到电报；海南特区报能否办理调动手续，尚不清楚。

创刊时的海南特区报

龙昆上村290号，是海南特区报的创办地址。下午，我走进这个城中村。只见狭长的小巷两旁，杂乱无序地拥挤着许多老平房。转过一个弯，一栋新建的5层小楼突兀眼前，在周边低矮破旧的建筑群中显得鹤立鸡群，惹人瞩目。大门左侧墙壁，挂着一块有海南特区报字样的小长方形铜牌，阳光下熠熠闪光。

总编辑唐凤林热情地接待了我。这位曾当过钱江晚报副总编、精明能干的老总，只有30多岁，前额宽大，眼睛微鼓，用难以听懂的浙江普通话，介绍了海南特区报的筹办现状和美好前景。说我来得及时，正赶上出创刊号，要我出任经济部主任、主编，负责二版采编工作。

随后，唐总带我到这栋租用的小楼转了转，并到各部门认了门。首席记者金紫紫，要闻部主任王哲，社会部主任吴达宣，副刊部主任赵东，杂文家王若谷……男男女女十来位，个个都是能独当一面的年轻人。

报社包食宿。小楼对面，一间平房是食堂，饭菜品种不多，但还可口。宿舍在3层，几个房间都不大，没有床，放了一张软垫，席地而卧。这在建省不久的海南，算是待遇不错的单位。

创办初期，海南特区报出对开4版周刊，各个版面自己“找米下锅”。经济部只有我和一位从新疆来的小伙子。从报到第二天起，我们就带着报社介绍信，前往省委省政府相关部门和一些企业采访、组稿。报社没有车，外出全靠步行和“三脚猫”，常常是早出晚归，废寝忘食。虽然辛苦，但乐此不疲。

1989年1月4日星期六，海南特区报创刊号出版，报社所有人员欣喜若狂，手捧报纸看了又看。晚上，唐总还叫食堂加了菜，上了酒，共同庆祝用自己心血凝聚的成果面世，庆祝继海南日报之后又一份综合性日报在海南大特区诞生。

“同仁报”梦碎，继续为海南特区鼓与呼

不久，羊慧明和周平来到海口，我们开始编织创办“同仁报”的梦想。我们拟出以教科书为重点的“南洋新报”办报方案，奔波在宣传文化、科技教育等部门之间，甚至在晚上登门拜访了分管新闻出版副省长，有刊号的海南科技报老总、副总和上级主管部门省科协领导。跑了几天，时而有希望，时而碰壁，最终铩羽而归。从此，我们断了创办“同仁报”的念想。因为最后得到的信息是：不管是新办，还是改办，不管是在内地，还是在大特区，都不可能允许出现一份另类的“同仁报”。

羊慧明和周平失望地离开海南，我继续留在海南特区报再看看。一看，就是两个多月。这段时间，我不光主编经济版，还采写一些新闻稿，为刚刚建省办特区的海南鼓与呼。在社会上引起些许反响，是几篇我署名为“本报记者林林”、每篇数千字的稿件。

通讯《公司公司，路在何方》：面对银根紧缩、美元汇率下跌、进出口出岛限制等方面的冲击，海口一夜之间冒出的林林总总的海内外投资公司，茫然、悲观，不知所措。我选择了几个以实业开发为主攻方向、路子越走越宽的公司，作了浓墨重彩的报道。文中小标题可见一斑，如“中岛：不投机取巧，不侥幸发财，一枪一枪地击发，一步一步一个脚印地朝前走”；“金海：立足艰苦奋斗，长期作战，不指望一觉醒来，就能迎来金色的太阳”；“×公司（外资）：遭遇坡坎坎而不气馁，坚定不移地热身特区开发”。

记者述评《粮食在向我们要挑战》：从报社炊事员抱怨粮价猛涨说起，分析了海南缺粮的现状、成因及对策思路，指出紧缺、昂贵的粮食，已使一些投资者、闯海人忧心忡忡，持续下去，势必拖延大特区建设的速度；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需品，不解决好吃饭的问题，就难以启动特区经济起飞；海南有得天独厚的发展粮食生产的优势，只要立足“特”字，狠下功夫，粮食基本自给大有希望。

通讯《一个美籍华裔经济学家对开发海南的意见》：我以现场采访的方式，报道了美国知名学者谢国忠对几个热点问题的看法，至今还有价值。比如，教育和农业是海南大特区建设的基础，打好了，经济起飞才有坚实的翅膀，台湾地区已经走出成功的路子；外商成片承包开发是个好方法，开发区主权在中国手里，与过去的租界不一样，我们不要有狭隘的民族观念；海南实行非公有制为主的混合所有制，是明智之举，采取哪一种经济制度，不一定要以哪一种政治制度来决定，要看它能否最有效地发展生产力；现在海南的优惠政策很多，但外商前来投资的不多，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特殊的体制和法规作保障，建议海南做些研究，拿出对策。

……

这些热点、难点问题的报道，引起了省市领导和很多投资者、闯海人的关注，也获得唐总及报社同仁的赞扬。

钟不敲不响，惊喜接踵而至

一天，在省人事厅采访时，了解到一个重要问题：海南特区报暂时没有编制，现在无法办理调动。

本来，海南特区报走市场化路子，办报自由度大，很对自己的胃口。但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没有编制，无法办理调动，只有辞职，这对需要养家糊口的我来讲，似乎风险过大。我打算回四川，到成都那家报社报到上班。

就这样离开喜欢的海南大特区，又心有不甘。临走时，我想到有编制的海南日报撞撞运气。一天上午，刚刚认识的新华社海南分社记者田川，把我推荐给报社一位副总，后者叫直接找主要领导。我壮着胆子，进门自我推销。一个头发短粗，身体壮实的中年男子，一边听汇报，一边翻看我的代表作和获奖证书。突然，他说，你不要讲了，这两篇我有印象，现在没有你的事了，你回去。我有些懵，事关一生命运的大事，上门自荐，仅仅几分钟就结束了，而且还说没有我的事。

几天后，正当我以为去海南日报无望，收拾行李，准备飞往成都的时候，一个电话让事情出现拐点。海南日报人事处通知我马上去一趟。到后，交给我一份调令，要求赶紧回四川办理调动手续。我反复细看，这真的是调令，而且是不需要试用和发商调函的调令。我喜出望外，惊叹特区特事特办的效率，也深深体会到钟不敲不响的道理。

惊喜接踵而至。离开人事处，在二楼转弯处，我差点与人撞个满怀，一看，竟是多年未见的川大同班同学秦增约。我和秦同学高兴得互相拍肩膀，询问来由。我喜滋滋地说，刚刚在人事处拿到调令。他更是眉飞色舞，有些骄傲地说：“我和二磊（另一同班同学王林磊）已经在这里上了一个多月的班”。哈哈，我们3个同学不约而同，都来闯海了，而且在同一家报社。

我高兴地返回家乡。小郝留在海南，参与组建一家出租汽车公司，开始编织心中的梦。

回到南充后，地委主要负责人两次找我谈话，希望留下，提出进入报社领导班子。在成都请求要回我的档案时，那家报社领导也热情挽留，说不来成都，丢掉两个进城指标实在可惜。领导都是好心好意，但我向往海南大特区，不愿放弃一生难得的重大机遇。我谢谢他们。我去意已决。

5月18日，办好调动手续的我，在成都双流机场，登上飞向海口的航班，正式闯海了。

春牛春杖，无限春风来海上。这是900多年前，被贬谪到天涯海角的苏东坡，在立春这一天，对海南春天的由衷赞美和热切期望。我和成千上万的闯海人没有受贬，而是主动踊跃地投身于海南，我们同样喜爱海南，同样憧憬海南美好的春天。